

另一种学术史：二十世纪学术薪传

张春田 张耀宗 编

吴瞿萍

韩儒林

斯年

余英时



南京大学出版社

另一种学术史：二十世纪学术薪传

张春田 张耀宗 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一种学术史:二十世纪学术薪传 / 张春田, 张耀宗编.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305 - 08985 - 5

I. ①另… II. ①张…②张… III. ①教师—回忆录—中国—现代 IV. ①K825. 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9463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另一种学术史——二十世纪学术薪传
编 者 张春田 张耀宗
责任编辑 芮逸敏 编辑热线 025 - 83593947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人文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20 印张 17.7 字数 280 千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8985 - 5
定 价 39.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编者序】

师承所在，流风未泯

张春田 张耀宗

怀旧不应该属于年轻人。事业未成，何事可怀？事业已立，何须再怀？但是，对于年轻的学人来说，“怀旧”是一项和学术研究同等重要的工作。它让年轻的学人得到慰藉、鼓励和前进的力量，也让年轻的学人找到重新出发的灵感和勇气。学术的怀旧不是美化历史的细节，它是一次次历史细节的复活，更是一次次对历史重新的阐述。

近三五年来，由于媒体与出版界的推波助澜，“晚清、民国热”、“八十年代热”在大众日常阅读生活中所处的位置已经非常明显。我们无意去投合这些“热”，但是这些时段及问题本身也是我们自己一直以来所关心的，这些“热”也促发我们新的思考。2010年我和

好友季剑青君合作编了一本《传灯：当代学术师承录》，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出来以后，反响似乎还不错。当时限于篇幅，自然有不少遗珠之憾，于是希望再编个类似的续集，便有了这本小书。明眼人一翻目录便会发现，虽然说是放眼整个 20 世纪学术史，比如收入像邓广铭先生回忆老师胡适以及傅斯年的文章；但是我们选取的文章的作者大多是近三十年成长起来的学者，也就是说他们无论是身居大陆还是成长于港台，基本都是从 1980 年代开始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崭露头角，相继在 1980 年代和 90 年代成长为各自领域的中流砥柱。陈春声先生在《学术评价与人文学者的职业生涯》一文对这样一个学术群体有过深入的思考。作为那个学术群体中的一员，陈先生将这个学术群体的位置历史化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苏力和陈春生主编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版），里面有详细而丰富的讨论。我们所选的这些文章不仅有对师辈的敬意，对学术传承的敬畏，对学术方法的阐发，也有字里行间的“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些文章不仅仅是单一的对师长的敬意，其实还包含了两代人之间的学术对话，学术道路的碰撞、汇流，而这些需要读者诸君自己去构建语境，将这些温情的怀念、平躺在纸上的宋体字还原成一个个立体的历史场景，一个个生动的历史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明白那些可能不可再得的历史契机的分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划破矫情的历史诗意，看到一种历史性的师生关系的生成，感受到那些回忆的发自于内心的力量，从而寻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自强”与“突破”的道路。

台湾“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在最近一次的访谈里面提到的当下人文研究的两个趋势，值得认真对待。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消失。他说：“罗素·雅各比写《最后的知识分子》，他所讲的其实很多都是 1970 年代的东西，他认为那时候已经是‘最后的知识分子’了。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觉得对社会舆论最有影响力的不是学者,而是媒体,尤其是媒体评论人、专栏作家。学者很少或偶尔才对现实问题发言,大家拼着命就是发表论文。这次核危机,也可以看出台湾学者和现实的一个困境,就是愿意以整体而比较宏观的视野来观察、省思一个问题、做一个合情合理的评论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大部分人都变得非常专门。着眼宏观的人,大部分都是写教科书的人,或‘不务正业’的学者及专栏作家,有学问的人反而没能做或不屑做。在我的学生时代,我同我的老师如果能以知识分子来自己期许的话,那就意味着要去做很多事情,要承诺很多事情,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现在如果再这样,似乎觉得你太古板、太老派了。我在台湾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状况。但我总是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还是应当有公共责任,还是不应该从社会撤离。‘知识分子的撤离’是一个大警句。”另一个现象是作为全球现象的人文心灵的退缩。他说:“整个世界的人文心灵都在退缩,这是一个全世界共通的问题。因为过度竞争,思想、精神层面都会世俗化,往下降低。我对这句话的解释很简单,因为你要竞争,你就要有看得见标准,就要把看得见的东西都统计化、数字化。过去那些属于人文的、精神特质的、地方特质的、传统性的、没法量化的东西,在竞争时就算不进去,就会居于劣势。所以大家都拼命做那些可计算的东西,使自己在竞争中高一点。结果就是大家一起往下降。这本来是以美国为主的,但是现在,这种趋势已经传向全世界。所以,属于精神特质的、带有人的主体独特性的、带有人文学科早期特质的那种东西,现在的处境都很难了。全世界大学的整个气氛越来越紧,以前那种自然而然、悠闲自在在研究学问的气氛没有了,每个人都急得不得了,不停地开各种策略会议。当然,与18、19世纪现代大学兴起的时候相比,现代大学的功能增加了很多,但是不能永远增加下去。这都是我对

当代人文心灵环境的观察。我很为此忧心。”(《学问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文汇报》2011年6月6日)王汎森先生所提及的学术的“统计化”以及“量化”，这一方面有可能形成良性的竞争，但是也不能不看到这些在具体操作层面涉及到学术资源的分配加上社会风气的变化(用1990年代初期的套话来说就是“商品经济大潮对纯洁学术的冲击”，这在当时听起来不免有点“书生气”，有点不知“窗外事”)，很有可能导致学术的“山头化”，学术共同体可能变成利益关联体。

说今天是一个“大师远去”，学术“碎片化”的时代，大概算不上大放阙词。这并非是简单指责当代学术混局乱相，而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内在的评价标准在激烈的变化之中，在不断地争论、磨合。这其中既有某一学科内部的争论，也有跨学科的争论。不同的学者对于“跨界”作品的评价其实很不一致，这里面的是非不是简单的“态度”问题可以说清楚，或许我们倒是可以偶尔适当抽身其外想一想为什么“跨界”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这里面大概不单单是学术自我生产的需要，更是时代某种变化带来的影响。与以前的“权威时代”不同，有人可以一言九鼎，争议随之慢慢化解。现在是大家的学术水平可以打个平手，在内心里未必谁就服气谁，最后要么是大家面子上过得去，一团和气，要么就是争锋相对。既然有立场之争，也就难免掺杂着意气之争。本来争论是好事，不必要故作“公允”或者“费厄泼赖”来取消问题意识，可争论一旦被牵扯进所谓的“心机”、“态度”之类的话题里面，反而失去了之前的问题意识，这也恰恰是发达的媒体时代给学术论争带来的挑战。媒体在学术论争之中扮演了双刃剑的角色。学术论争一旦成为公共话题，对学术究竟更有助益还是更多败坏，值得认真思量。当下学术“碎片化”时代最容易出现的现象就是，学术论争往往无法沿着既有的问题框架进行，而是言在此意在彼。这对于推动学术的好处就是让学术与社

会的互动更为紧密,逼迫一些人文学术的研究回到“源头”,回到社会生活,对学科的基本问题进行重新的提问,这在某种意义上也促使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跨学科”研究颇为繁盛。而可能带来的问题,就是既然问题的争论无法深入,那么只能在一些“态度”、“心机”等话题上打转,最后造成学术论争完全受制于外力,而越来越失去自己的规范和自我约束,直接后果未必是学术风气的大坏,而是学者的自我分裂和学术的“繁盛”背后的平庸化。

学术与世风之间的互为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里面早已不是新鲜的话题,但是它像是一个主题,在不同的时代语境里面,可以激发起这个时代人的具体的而又丰盈充沛、生动活泼的历史的现场感,将自己的语境重新注入到这个主题当中去。钱穆在一次题为《学术与风气》的演讲里,结合他自己时代的学术风气感叹道:“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诸人,岂不是我们这一时代之大师!但实由前一时代所培植。我们这一时代,若无此数人,将会更感黯淡,更无光彩。”批评钱穆的话可能不是难事,但是钱穆所指出的这些问题的缘由,则未必不值得认真倾听:“学术传统,究与政治传统有不同。学问事业,究与社会事业有不同。……又该懂得分工合作。在学术圈子外,尽有活动、有事业,不能由学术界一手包办。在学术圈子内,也可各有研寻,各有成就,不能由一个人作唯一的领导,也不能由一个派系作唯一的霸占”,“由于政治社会不断变动,把学术风气冲散了。但也因学术界变动,而增添了不少社会政治上之变动。”世风极大地影响了学术,学术反过来又可影响世风。对于每个以学术为志业的人来说,所能做的只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守住了“知耻”的道德伦理底线,学术的生态则有慢慢恢复、慢慢成长以至于繁茂的希望。钱穆在这里对他的民国时代学术界的批评,其实有一番“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灯火”的自强不息之意。

相信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学术的尊严与精神的魅力。在 20 世纪的历史中,这些学者以他们的学问与人格,赢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尊敬与纪念。面对学术的碎片化与人文心灵的萎缩,“却顾所来径”就有了继往开新的意思。不同的人对同一时代的描述不一样,因为个人的兴趣、性情、成长经历等等都不一样。这些内在于我们生命的个人史,使得我们的历史叙述有了一个隐含的起点,由此我们才能连接起对过去、对现在以及关于未来的想象。薪火传承本是动人的风景,希望也能构成继续前行的资源。如果这本小书,能够给无论是在暗夜中前行,还是已身处阳光灿烂的日子

的读者诸君一些启迪,那么首先应该感谢贡献了这些好文章的作者们。很多作者不仅慷慨授权,而且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鼓励,让人尤其感念。书名《另一种学术史》借用了陈平原先生一篇文章的题目。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编辑芮逸敏女士出色的学术眼光与认真细致的工作,使得本书最终得以面世,在此谨致谢忱。

2011 年 7 月香港—北京

目 录

张春田 张耀宗 师承所在,流风未泯(编者序)

程千帆 忆黄季刚老师 1

邓广铭 回忆两位老师 19

钱谷融 我的老师伍叔悦先生 39

王兆鹏 我的老师唐圭璋先生 45

柯庆明 那古典的辉光——思念台静农老师 57

姚大力 琐忆韩师 75

王得后 一个人的学问、信仰和作为——埋在我心中的李何林先生 85

沈 津 一片冰心在玉壶——怀念潘景郑先生 97

陆谷孙 秋风行戒悲落叶——忆师长 113

袁行霈 燕南园六十二号 127

汪 晖 明暗之间 135

邓小南 跟随王先生读书 145

陈平原 此声真合静中听——怀念陈则光先生 151

- 秦 晖 教泽与启迪：怀念先师赵俪生教授 159
- 罗志田 把意境深远的话说得风韵疏淡——忆张芝联先生 185
- 甘 阳 梦邹谠 193
- 张 源 一条没有走完的路——为纪念先师殷海光先生逝世
两周年而作 197
- 许纪霖 “我是十九世纪之子”——王元化的最后二十年 207
- 裘锡圭 怀念我敬爱的朱德熙先生 221
- 钱志熙 湖畔的思念 229
- 韩 钢 生命最后的大事记——悼龚育之老师 241
- 巫 鸿 张光直，哈佛，与我 255
- 倪文尖 钱先生的散淡人生 267
- 王德威 读《谈文艺，忆师友》：兼记《瞎三话四集》 273
- 扬之水 以“常识”打底的专深之研究——读孙机先生著作
散记 279
- 王汎森 史家与时代：余英时先生的学术研究 289
- 陈建华 狐狸说诗——李欧梵教授课堂散记 309
- 沈卫荣 学术偶像崇拜和学术进步 315
- 陆 扬 花前又见燕归迟——追忆牟复礼先生 333

忆黄季刚老师

程千帆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曾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任教。代表著作有《黄侃论学杂著》、《黄侃日记》等。

程千帆(1913—2000),1936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78年任南京大学教授。代表著作有《文论十笺》、《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考索》等。





黄侃先生

紫荆散管靜端觀
 歲月下漸紫磨月
 乾坤富
 事青雲慕卷寒
 好家誰
 大知相識、陽山
 林獨見
 始
 自有木
 辰西
 最好
 柳中
 野且回
 梳
 素素不
 去而
 北山
 先生
 詩
 索之
 勉之
 元月
 辛酉
 以人
 侃錄
 蕉作

黄侃行书七言诗

一 最后一堂课和最后一首诗

1935年10月5日下午，天气很阴沉，我在金陵大学北大楼朝北的一间教室里，在听季刚老师讲《诗经》。老师晚年讲课，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兴之所至，随意发挥，初学的人，往往苦于摸不着头脑。但我当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倒觉得所讲胜义纷陈，深受教益，可是老师讲书，也并非完全从学术角度着眼，而每用以借古讽今，批评时政，针砭时弊。这一天，他正讲《小雅·苕之华》，当他念完末章“牂羊坟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鲜可以饱”之后，又接着把《毛传》“牂羊坟首，言无是道也。三星在罍，言不可久也”，用非常低沉，几乎是哀伤的声音念了出来。既没有对汉宋诸儒训说此诗的异同加以讨论，也没有对经文和传文作进一步的解说，但我们这些青年人的心弦却深深地被触动了。

当时的情景，现在还牢牢地铭记在跟我一同听讲的孙望先生和我的脑海中。四十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回想往事，也就更其能够亲切地体会：一个曾经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这一伟大事业献身的革命学者，眼看着祖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法西斯统治之下满目疮痍而无力挽救，其内心的痛苦是如何巨大了。

老师的谈锋不知怎么地一转，又议论起中西文化和生活方式的

比较来。他由木版书便于批点,便于执持,便于躺着阅读等等方便,而讥讽精装西书为“皮靴硬领”;又谈起中装之文明和舒适远胜西装,他当即并不用手而把自己穿的布鞋脱下,然后又穿上,并且对一位坐在前排的同学说:“看,你穿皮鞋,就没有这么方便。”很显然,季刚老师并不是什么国粹主义者、顽固分子,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他对于当时买办阶级全盘西化论者“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圆”的论调,是非常鄙视的。这种开玩笑的中西文化比较论,只是他爱国忧民愤世嫉俗的一种表现而已。

下课铃一响,老师抱起他那个黑布书包,走出教室。我们再没有想到,这就是他给我们上的最后一堂课。

10月4日是星期五,6日就是农历的重九节。季刚老师是一个有山水胜情的人(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南京又是一个“千古风流佳丽地”,所以他在一般情况下,断无不出去登高之理。但这一天却独自坐在九华村量守庐的书房里,郁郁寡欢。他想起了李后主的《却登高文》,有所感发,作了一首七言律诗:

秋气侵怀正郁陶,兹辰倍欲却登高。
应将丛菊露双泪,漫藉清樽慰二毛。
青冢霜寒驱放雁,蓬山风急扑灵鳌。
神方不救群生厄,独佩萸囊未足豪。

刚刚作好,林尹先生(字景伊,著名学者林损的侄子,钱玄同的学生,当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书,现在台湾)来看他,他就将这首诗给林先生写了个条幅。就在当天,老师因饮酒过多,胃血管破裂,抢救无效,两天后,即10月8日,就不幸逝世了。同样,谁也没有想到,这就是他最后的一首诗,最后的一幅字。

儒家哲学认为:兼善天下是人生最终目的,季刚老师也是这么想的。这一篇诗以雁象征流离的人民,以鳌比喻猖狂的日帝,对于

自己虽能安居治学却缺少救国的“神方”感到内疚。思想境界是多么崇高！求之古人，只有宋王令《暑旱苦热》中所写“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其胸襟可以相提并论。汪旭初先生在其季刚老师周年祭悼词中说，“季刚伤时纵酒，遂以身殉”，这是事实。老师只活了五十岁，是我国学术上无可估量的损失。

二 大师之大

具体地评赞季刚老师的学术，我是没有资格的。这应当由健在的一些老学长像陆宗达、黄焯、殷孟伦诸先生以及现在台湾的潘重规先生来谈。因为他们是得到了老师的真传的，而我则及门恨晚，所知无多。

但老师是中外学术界公认的大师之一。在老师生前一直到死后，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师之大，大在何处？现在我想就自己此问，自作一答。

首先，我觉得季刚老师的学问是即博且专的。无论你用经、史、子、集、儒、玄、文、史，或义理、考据、词章来分类，老师都不仅有异常丰富的知识，而且有非常精辟的发明。他在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那就不用说了。他所批点的《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新唐书》，从句读到训释，都有许多发前人所未发之处，其研究成果虽然没有正式公布，但有过录本流传，世所共知。《文选》也是如此，章太炎先生曾经将他和李详先生并举，认为两人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文选》学家。《〈文心雕龙〉札记》则开创了一代古典文论研究之风。至于文学创作，无论是骈文、散文、诗、词，都写得很好，自成家数。虽然老师对自己文学上的成就并不满意，认为古人是“天九”，而他只是“地八”（见刘博平先生《师门忆语》）。但

“地八”终究是仅次于“天九”的“地八”。关于哲学，季刚老师的论说不多，但一篇《汉唐玄学论》，至今仍是研究我国中古哲学的重要文献，而于其他论文，也见出其“名理校练”。总之，如果将我国整个古代学术比做十项全能运动，那么老师除了保持了一两项世界纪录以外，其他项目的平均积分也是很高的。

第二，季刚老师脾气很坏，爱骂人，这是学术界都知道的。但是人们往往乐于传播他性格中狂放的一面，却忽略了他性格中非常谨慎谦虚的一面。他和刘师培先生在北京大学同事，因为自己的经学不如刘先生，就正式拜他为师，这件难能可贵的事说明了他年轻的时候就很谦虚。在日记里，他曾经提到自己读书很快，但记忆力不够好，所以每要引用一条材料，即使极熟的书，也要核对。他在课堂上曾对我们说：“我讲小学比较‘自如’，讲经学，拿着书还怕讲错。”在讲声韵学的时候，他极口称赞曾运乾先生的《喻母古读考》是个重要的发明。我流寓成都时，还在赵少咸先生家里，读到过老师复赵先生的信，措辞极其谦和。赵先生去信赞赏老师所撰《音略》，老师则回答说：“尝自笑非经略之略，乃疏略之略也，何意先生称道之乎？”可见得他论学待人，一贯如此。至于对于国民党中那些卖国贼、贪官污吏，学术界中那些欺世盗名之徒、崇洋媚外之辈，不留情地加以怒骂，或者大声呵斥一些懒惰的学生，那又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呢！

第三，季刚老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也是使得他本人和他的学派取得成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老师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泼、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作字，但是有一条，无论怎样玩，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日记是要记的，白天耽搁了，晚上就一定要补起来。他在日记中曾经提到：

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亦三过，